

论近代湖南城市现代化之变迁

黄琴 王继平

【摘要】湖南城市现代化肇始于19世纪末。区分为传统的政治军事中心转变为工商业城市、通商口岸的开放启动了城市现代化的进程、旧式工商业城市转型为现代城市以及新的工业的兴起造就新的现代化城市等类型。到1949年，湖南城市的工商业获得一定的发展，逐步由传统的政治中心转变为工商业中心，城市公共事业和文化事业建立并获得发展，市民的参与意识增强并形成机制，湖南城市奠定了它的现代化初步基础。

【关键词】近代 湖南城市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16)05-105-06

城市现代化，一般是“指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活方式等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转变过程，它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概念。”城市现代化考量的指标有很多方面，就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类型、动力来看，城市工商业的普遍发展、城市公共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兴起、市民参与意识的激发是最重要的指标。近代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时期，现代工业的出现并由此导致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此展开，作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方面之一的城市现代化亦次第推进。湖南的现代化及城市现代化也在这一时期渐显端倪。本文以长沙、株洲、湘潭、岳阳四个具有不同特色的城市为中心，考察晚清湖南城市现代化的进程。

—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外力刺激下的现代化类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牢固结构，被西方的洋炮和洋货打破，逐步解体，出现了现代的工商业，引起了上层建筑的变化，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历程。鸦片战争后，这一过程首先在东南沿海五口通商地区开始，并随着沿江口岸的开放，逐步向内地扩展。就全国而言，始于19世纪的60年代。首先是洋纱代替土纱、洋布代替土布，使纺与织、耕与织相分离，渐次洋铁、洋火等工业产品进入城乡，进一步摧毁了中国的小手工业作坊，从而使中国具备了自由劳动力、市场和资金，也就具备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经济开始迈入现代化的门槛。19世纪末，新兴的阶级力量成长，西方的政治学说传入中国，倡导政治变革的思潮兴起，并且开始了政府自身的现代变革和民间政治变革的诉求与实际运动，由此开始了政治的现代化进程。

近湖南城市的现代化开启时间晚，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湖南地处内陆，鸦片战争前，由于广州一口通商，从广州到内地的进口商品和从内地到广州的出口货物，均需经过湖南，因而造就了湖南若干中小转口贸易城市，如湘潭、洪江、常德、岳阳，但这并不意味着湖南城市现代化的开始，它只是传

统经济结构的一环。湖南城市的现代化起步，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 19 世纪末开始的。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商品的输入以及对中国原料的需求，湖南也开始了自然经济的解体，但由于地处内陆，其过程是缓慢的。湖南乡村自然经济解体的主要表现一是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和粮食的商品化趋势，二是手工业的结构变化。在洞庭湖区，经济作物的种植比较发达。以棉花而论，鸦片战争后“民间种棉花者亦日加多”，其中“以临湘为最”，“每年出产约五千万斤”，其次，“湘乡、攸县、茶陵、衡山、永州、巴陵、华容、桃源、龙阳、沅江、泸溪、澧州、石门、安福、安乡、慈利、桂阳等进出产亦旺，长沙、湘阴、浏阳、醴陵等处次之”。不过，随着中国农业日渐卷入世界市场，棉花生产也感受到压力。在岳阳，由于洋纱的进口，土棉价格下降，商人收购，“抑其价钱”，棉业受到影响。

与此相反，传统的茶叶生产在战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且制茶工艺也有所改进。战前湖南以生产黑茶为主，“道光二十前后，英人之在粤南之对华贸易，已有相当进展，时输出品以茶为大宗。两粤茶产不多，多由粤商赴湘示范，使安化茶农改制红茶。因价高利厚，于是各县竞相仿制，产额曰多”。岳阳在“道光二十三年，广人每持重金来制红茶，土人颇郭其利”；而平江因国际市场“红茶盛行”，“凡山谷间，向种红茹之处，悉以种茶”。根据资料统计，鸦片战争后，由广州出口的红茶，有 50% 以上是由湖南茶区提供的。

以种植各物为主的传统农业，也开始出现向商品化的转变。湖南是著名的水稻产区，粮食的商品化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存在。鸦片战争后，湖南粮食的商品化程度逐渐提高。其中又以“湘潭之易俗河、长沙之靖港为最大”，易俗河每年输出约 150 万石，靖港约 100 万石。一般居民，也“添设店铺”，购销粮食，“数倍从前。”

与农业紧密结合的传统手工业，在鸦片战争后的湖南也有了一些变化。在洞庭湖一带的手工纺织业，渐次受到外国洋纱洋布的冲击，出现了纺与织和耕与织的初步分离。原来依据土花织布的岳州，“后乃用洋花，钱千百斤者八矣”，原来仅妇女据以为家庭副业的手工纺织，现在“男妇童稚皆纺织”，成为一种独立的手工业。

但就现代工业而言，湖南出现比较晚。虽然倡导洋务事业的多为湘籍人士，但湖南本省仅于 1876 年(光绪二年)建成湖南机器局，被称为湖南近代工业之嚆矢，这比曾国藩于 1861 年创设的中国最早的近代工业一安庆内机械所要迟了 15 年，且存在时间也很短暂，因经费短缺，才一年多的时间便告夭折。直至 1895 年 10 月陈宝箴担任湖南巡抚，在实行创办实业的新政中，创办了湖南矿务总局，开始了湖南现代工业的起步。随后，又陆续兴办了铁路、轮船、邮电、轻工业等各种企业，开始了湖南现代工业建设。但是直到清政府灭亡，湖南工业发展是缓慢的，较快的发展是在民国建立之后，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前十年，湖南工业获得较快发展，奠定了湖南现代工业的微薄基础。

政治层面的现代化，应当说湖南起步较早。戊戌维新运动时期，湖南是最有生气的省份，在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的支持下，次第举办了一些新政：南学会具有地方议会的性质，举凡地方兴革皆决于此；保卫局是中国最早的警察机构；迁善所具有福利和慈善性质。此外，兴学堂、办报纸，对于开启民智，普及科举具有重要意义。到 20 世纪初年，又建立了咨议局等民意机构，促进了市民（当然首先是上层

）的参与。辛亥革命之后，伴随民主共和的建立，民众的参与意识逐步强化，推动了城市现代化的进程。

从湖南城市现代化发展的进程来看，它是由中心区域向外扩张的。现代化的启动是由长沙、湘潭、岳阳、株洲等中心城市开始，逐步向湘南、湘中、湘西北等区域扩散的。整体而言，随着扩散的范围扩大，边缘地区的现代化程度逐步减弱。有的城镇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其现代化基础还非常薄弱。

二

近代湖南城市现代化，由于各城市的基础、区位、优势各不相同，其发展动力和道路亦各不相同。从发展动力来分析，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一是由传统政治中心转变为近代工商业城市，省会长沙具有典型意义。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传统城市是统治的中心，因此一般来说它是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其经济和文化的功能并不彰显。自康熙三年（1664年）湖广南北分治，长沙便成为湖南行省省会，成为湖南政治、军事的中心，就工商业发展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远远不如湘潭。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19世纪末以来，它凭借其政治中心的优势，在向工商业城市转型的过程中获得先机。

二是通商口岸的开放促使城市的现代转型，岳阳即是此类型。岳阳是洞庭湖区最大的城市，又据长江岸边，长期以来是洞庭湖区商业集中之地，又通过长江联结川黔地区。1898年3月28日，总理衙门奏请开放湖南岳州为通商口岸。自此岳州城成为中国第三个（前两个分别是上海吴淞和福建三都澳）、湖南第一个自主开埠通商的城市。岳阳开埠后，现代工商业次第展开，1901年，第一家私营采矿工厂——宝成公司在临湘创办，开采铅锌矿；1902年，湖南省炼矿总公司在岳阳设立总厂，提炼湘省各地矿砂。1909年，邑人曹典芪在竹荫街创办“立生制皂厂”，年产达60箱，为城区化学工业之始，也是城区最早开设的私营工厂。岳阳辟为商埠后，通商国家有英、日、美等12个国家和香港、澳门地区，其中英、日、美为主销市场。据岳阳海关统计，1900年由汉口转运进口的洋货总值7.89万关平两，其中洋纱总值占18.7%。1902年进口总值增至49.9万关平两。现代化事业渐次推进。

三是新兴产业的建立形成或带动现代城市转型与发展，株洲的成长就是一个范例。株洲长期以来只是隶属湘潭的一个城镇，自粤汉铁路开通以后，它迅速成长为一个现代城市。1897年，清政府决定修筑粤汉线。粤汉铁路株洲境内分两段筑成，计71公里。株洲至长沙55公里，由湖南铁路公司集股承筑，于1909年8月开工，1911年1月通车，株洲境内13.34公里。1918年，武昌至长沙段筑成，与株、长段接轨，称湘鄂段。1898，清政府决定修建萍（乡）、醴（陵）铁路，次年8月开工，1903年8月竣工。1905年延至株洲，成为湖南省第一条铁路。1936年9月至1938年12月，随着粤汉铁路和浙赣铁路的通车以及湘黔铁路至蓝田（今涟源市）段的开通，株萍铁路就并入了全国铁路交通大动脉网路，至此株洲成了粤汉、浙赣、湘黔三条铁路干线的交汇点。从此，株洲成为南方重要的铁路枢纽，开始其现代化城市的发展道路。

四是传统工商城市的现代振兴，湘潭即是这种类型。清代实行闭关政策，只开放广州一口通商，湘潭即成为内地——广州——内地商道的重要货物集散地。当时的湘潭，“杨梅洲至小东门岸帆檣样集，连二十里，廛市日增，蔚为都会，天下第一壮县也”。鸦片战争以后，开放五口通商，上海逐步取代了广州的地位，湘潭工商业受到影响：“从前海禁方严，番舶无埠，南洋、五岭之珍产，必道吾埠，然后施及各省。维时湘潭帆檣鳞萃，繁盛甲于东南，相传有‘小江南’之目。厥后轮船、租界蔓延沿边，商旅就彼轻捷，厌此艰滞，而吾湘口岸，始日衰耗。”近人还曾评价说：“轮船传入中国后，往返于广州、上海和汉口（之间）的定期航班，削弱了湘潭的重要性，从此，湘潭就开始衰落了。”虽然多口通商和商路转移给湘潭的商贸地位造成致命性打击，省内经济中心的地位日趋丧失，然而湘潭在数百年间积淀的深厚的商业氛围、坚实的商业根基、庞大的商业群体，使它得以在未来数十年里仍然作为国内物资集散的傳統市場和省內貿易重鎮繼續發展。逐漸向土洋并存轉變。如蘇廣貨業，五口通商前主要经营苏、浙、粤等省各种地方物产，全省各州县都从湘潭批发，五口通商后，湘潭苏广业部分商家开风气之先，开始从广州、汉口、上海等地购进洋货，转销省内长沙、衡阳、邵阳等地。一时之内，洋货源源输入，渐渐后来居上。19世纪末，湘潭开始出现现代机器工业。1894年春，湖南省矿务总局成立，是年冬，省矿务总局拨付官银82204两，设立湘潭小花石煤矿采煤，年产5500吨左右，成为湘潭第一个官办工矿厂。此外，王时雍在朱亭开办金矿；张本奎、萧仲祁、王国柱创办湖南化学制造公司，用土法提炼樟脑，成为湖南化学工业的第一家企业。1897年建立的肖汉记机器厂，以修配轮用机件为主，兼制面粉机和救火机；同年，张仁美铸造厂设立，“天宝珍公司”和“福祿公司”陆续开业，开采龙山锑矿。由此湘潭开始了重新崛起，开启了现代化城市的进程。

因此，湖南城市现代化因其动力不同而存在四种类型，但主要是由政治型城市转型为工商业城市 and 传统工商城市的现代转型与振兴这两种类型为主。

三

经济现代化是城市现代化的基础，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是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由政治型城市向工商业城市转变。

从长沙、株洲、湘潭、岳阳四个城市的工商业发展来看，经历了三个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是湖南城市工商业发展的起步阶段。甲午战争以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实业救国的思潮兴起，加上清政府的奖励政策，湖南开始创办新式工商业。1895年10月，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他上任后，奏请开设官矿管理机构——湖南矿务总局。湖南矿务总局成立后，对湖南矿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另外，一些规模较小的煤、铜、硝、磺、银、铁等矿，亦遍布全省各地。与此同时，一些民间资本也开始投资工商业，如1895年的湘裕炼矿公司、和丰火柴公司。从19世纪末开始，长沙市是全省近代工业最早的发轫之地和最为集中之地，20世纪初开埠后，又渐渐成为外贸进口的分配中心，并逐步发展成为全省最大的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

长沙之外，湖南其他城市也开始创办近代工业。1895年湘潭第一家近代企业小花石煤矿成立后，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首推1894年湘利黔织布局的创办。湘利黔织布局是湖南机械纺织工业的肇

始，创办人是近代著名革命志士、湘乡人禹之谟。在禹之谟兴办实业示范效应下，几年间湘潭城区相继创办了四家新式机坊工厂，湘潭得以成为清末湖南省内纺织工业中心。这四家机纺工业厂家分别是豫丰昌、永和祥、赵孚盛、韩德顺。除了以上机器纺织业和新式矿业以外，湘潭在开办新式工矿业方面还有杨梅洲船厂、湖南瓷业公司、冶炼锑矿、湘潭电灯公司、杨梅洲锅炉修理厂、恒豫公司等等。

岳阳是湖南的第一个通商口岸，自开商埠通商，加强了岳阳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对外贸易开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起来。据岳阳海关统计，1900年由汉口转运进口的洋货总值7.89万关平两，其中洋纱总值占18.7%。1902年进口总值增至49.9万关平两。除此之外，岳阳也次第开办了矿业、化学等新式企业。

衡阳的近代企业主要集中在矿冶，特别是常宁水口山铅锌矿迅速发展，1904年，水口山铅锌矿采用新法开掘斜井，成为湖南省第一个使用机械排水和运输矿石的矿山。1909年，水口山矿务局总办廖植基建成机械重选厂，为全国第一家重力选矿厂。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粤汉、株萍铁路开始修建，内河航运业使用新式轮船，建立了航运公司。

辛亥革命以后，湖南城市经济现代化进入第二个时期。由于北洋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发展与保护工商业的法令、政策，湖南工商业得以快速发展。首先是矿业的发展，湖南是有色金属之乡，欧战对有色金属的需求，刺激了湖南有色金属矿业的发展，据统计，至1916年，湖南新增矿厂在8000家以上，其中锑业最多，次为铅锌业。到1918年，全国采金业13处，湖南占3处；采钨业5处，湖南占2处；采铅锌业3处，湖南占1处；采锑业4处，湖南占3处；采锰业1处，在湖南。在全国较大的30处有色金属矿业中，湖南占三分之一，奠定了湖南有色金属大省的地位。

矿业之外，湖南轻工业也获得发展，仅在1919年注册的轻工企业就有11家，资本达161.7万元。其中较大的有和丰火柴公司、湖南电灯公司、醴陵瓷业公司、麓山玻璃公司、湖南第一纱厂、湖南面粉公司等等。

此外，在湖南其他城市，民族工业也获得一定发展。其中进展较快、卓有成效的是湘潭。这一时期，湘潭比较著名的工矿公司有1913年创办的唯一石膏矿业公司（后改名为唯一奔盐矿公司）、1914年创办的裕牲矿业公司、1915年的富有煤矿公司及1918年的大明电灯公司。唯一膏盐矿公司创办之初，矿区面积5100亩；公司备有熬盐炉2座，孔明车数架；公司职员26人，矿工约260人，临时雇用采膏工人约500人左右；公司资本约8万元。到1925年，唯一公司年产膏盐4万余担，熬盐7000余担。裕牲矿业公司是一家锰矿公司，创办于1914年，公司成立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锰矿是炼钢的重要原料，国际市场锰砂价格大幅攀升，供不应求，公司一时获利极厚。当时公司职员有50余人，工人1000多名，年产锰3万吨以上。1915年创办的富有煤矿公司，是一家较大的煤矿公司，雇佣工人600多人，年产原煤7.2万吨，带动力当地煤业的发展。1918年到1926年，俊发、惠元、昭潭及日商维善、中吉、大丰公司也在谭家山采煤，用火力发电，用电力抽水送风。至国民政府初期，湘潭县境

内的煤矿公司共有 14 家。

除了以上几家大型工矿外，民初湘潭还涌现了许多小型厂矿。例如造船厂，当时湘潭共出现造船厂 30 多家，造船工人达 700 多。1916 年，天福公司申请开发龙家塘龙胆石山岭附近铅矿。此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对军需原料的大需求，刺激了湖南矿业的迅速发展，轮船运输随之业务猛增，围绕矿山机械和轮船机件而建立的机器修配厂相应增加。适应这一要求，1914 年，王顺泰、袁新发两家锅炉修理厂在湘潭先后开业。1917 年，吴作霖呈请政府开办电厂，但仅修建部分厂房和少数电杆便告终。同年，长沙人黄雁九由沪回潭，出资向吴作霖购买了营业权。1918 年 7 月，黄雁九、郭又生、周汉春等人筹资续办吴作霖呈办的电厂，成立湘潭大明电灯公司，选址在十八总由义巷，宣告湘潭从此告别依靠煤油照明的历史，进入了生产和使用电能的时代。此后几年，陆续有湘乡新明电灯公司、谭家山东茅塘俊发煤矿公司电厂创办。

湖南城市工商业发展的第三个时期是国民政府建立后的前十年(至抗战爆发)。在这一时期，湖南工业获得较大较快的发展。首先是重工业开始发展。1932 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前身为国防设计委员会）开始规划《后方计划》，希望在长江以南建立一个相当于东北沈阳、鞍山、抚顺一样的工业区，地址便选中了湘潭。以湘潭为中心，通过粤汉铁路和即将通车的湘黔铁路北通武汉、南达广州、东抵华东、西连大西南。在抗战爆发期，中央电工厂、中央钢铁厂、株洲电力机车厂、中央机器制造厂（飞机厂）等等也相继开工建设。国民政府前期湘潭工业的规模化建设与发展，在现代湖南工业发展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电子工业、装备工业、钢铁工业在湖南兴起，奠定了湖南工业发展的基础。

其次是交通运输获得快速发展。1929 年以前，湖南公路里程共 463.14 公里。1929 年，国民政府建立湖南省公路局，制定了修建湘粤、湘桂、湘黔、湘川、湘赣、湘鄂东、湘鄂西等 7 条公路干线和 13 条支线，共计 13497 公里的庞大计划，截止到 1937 年，共完成 2108 公里，虽然距计划差距甚远，但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湘黔线的开通，对湘西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省营工业也获得发展，首先是形成了以三大省营机械、电器厂为支柱、包括 60 多个机械、电器厂的机械电子工业；二是出现一批制造机械产品的工厂，如机床、粮油机械乃至收音机、收发报机等；三是成功试制了煤气、酒精汽车。

总之，抗战前 40 年，是湖南现代工业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时期，为湖南现代化事业打下了基础。此后，虽然抗战期间东部地区的工业内迁至湖南，一度造成湖南工业的繁盛，但随着日军的南侵，这些工业或迁到西南，或迁到湘西，抗战后又回迁东部。因此，抗战期间，湖南工业发展极为艰难。湖南现代工业的基础，是抗战前建立起来的。

四

城市现代化的另一考量是城市公共事业的发展程度。在中国传统城市，市政一般由行会组织，或由缙绅发起倡议，民众参与，如救济、救火、洒扫。在清末新政时期，开始创办警政、户政，市政才

有了起步。湖南在维新运动时期，长沙创办了保卫局并附设迁善所，保卫局由官商合办，设于长沙城内，由黄遵宪任总办，下设会办大员1人，委员4人，由官方派员充任；另设会办1人及议事10余人，由地方绅商推举；并于长沙城厢内外设东、南、西、北、外东、外西6个区分局，各分局下设6个小分局。其主要职责为“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索罪犯。”具有现代警察局的作用。保卫局附设5个迁善所，专门从事收容游荡滋事以及经各分局断定罪行尚轻需要迁善的人员，或充当劳役，或令其学艺，对改过自新的予以释放，经教育不改的则送府、县处理。“戊戌政变”后，撤销保卫局，归属保甲局。1902年，改为湖南保甲团练总局。1904年长沙开埠后，增设长沙商埠巡捕局。

湖南城市公共事业的全面展开，是民国年间，首先在长沙。1920年6月，谭延闿第三次督湘，首先改良长沙市政管理，并效仿北京、广州先进的市政管理体系，设立长沙市政厅，把商埠马路工程处并入其中。首先是拆除城墙。城墙在传统社会有军事防御的作用，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人口增多，建筑密度大，城墙成为城市发展的障碍，清末时就曾建议在城墙处修筑环城马路。

此外兴办了电灯、邮政、电话、电报、给排水等公共设施。1896年，长沙至武昌电报线路竣工，是省内第一条有线电报线路。后设官督商办长沙电报分局于南正街，是湘省第一所电报通讯机构。1897年湖南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在又一村装机设厂，长沙开始有了电灯照明；1899年长沙邮政分局成立，1905年湖南巡抚衙门第一架电话开通，这些公共共用设施促进了长沙的经济、交通和文化交流，标志着长沙具备了现代市政。

继长沙之后，现代市政也在其他城市次第开展。1899年11月29日，湘潭邮政支局成立，属岳州邮政局（后改属长沙）管辖。湘潭邮局在城区设邮筒12个，每日开筒收信5次，以方便百姓；每日发交湘潭到长沙轮船带运邮件4次。1894年，湘潭建立了第一家电报子局，支线连接湘潭至长沙，形式为官督商办，办公场所设立在城内黎家祠堂，使用莫尔斯机开办政治、军事、商务电报和新闻业务。它的开通成为湘潭电信行业建设的起步。1911年，电报线路延伸至湘乡，是年农历十一月，湘乡设电报营业处。1902年，渌口新设邮政代办所，归属湘潭管辖。1903年，湘潭至湘乡的邮路正式开班，是年4月湘乡县城设立的湘乡邮局成为湘乡最早的邮政机构。湘乡县内除在县城设立邮局外，还在其属地永丰、潭市等地设立分局，扩大了新式邮政的覆盖面。1910年又设朱亭、三门两家代办支局和淦田信柜，次年钊陵、马家河、白关铺三家代办支局与姚家坝信柜设立。1913年1月，北洋政府宣布全部撤销国内驿站，湘潭支局升格为湘潭邮政局，机构级别、业务范围与业务水平均获不同程度提高。1914年，按照邮局业务量和营业收入的标准考察，湘潭邮局由原来三等甲级晋升为二等乙级。同年，随着中华邮政加入万国邮联，湘潭邮政局业务突增，先是增办港澳及国际信函业务，后又开办兑换国际回信券业务。1921年后，为适应商务往来需要，邮局还增办商务传单、货样、贸易契、盲人文件等业务。1923年，邮局增加保价信函业务。

1909年5月，湘潭新设巡警总局，另在局内创设消防队，配备14名消防工作人员。1910年10月，湘潭城区创建了一家县立图书馆，与京师图书馆创办于同一年，这也是湖南省内最早的一家县级图书馆。

1935 年，为方便长潭、潭宝、潭衡公路与火车站的联系，湘潭又修建了从火车站到城区的贵阳路，进一步改善了市内交通，湘潭市政迈上了现代化道路³

岳阳作为通商口岸，市政建设先从邮政开始。1899 年，岳阳被辟为商埠后，根据大清邮政《关于各通商口岸之海关税务司兼邮政司》的有关规定，城陵矶海关设立岳阳邮界及岳阳邮政总局，辖岳阳、长沙、常德、湘潭个邮政分局，为湖南省第一个近代化的邮政机构。同年，岳阳邮政分局在城陵矶设立，开始经营信函、明信片、印刷物、商务传单、货样、包件、汇兑等业务。1902 年，设岳州沿湘江经长沙至湘潭步班邮路，全程 208 公里，为湖南省最早的一条干线步班邮路。嗣后，岳阳邮界不断扩展，到 1908 年已扩展至湘西乃至贵州铜仁、四川来凤等地，附近各县都开有旱路、水路邮班，并且开始用火车、轮船运递邮件。1907 年，武昌至长沙电报线路全线竣工，岳阳于当年 5 月设立电报分局，正式对外开放营业。1900 年，岳州府始设警察科，巴陵县设警务公所。1906 年，根据湖南警务总局颁布《湖南全省警务章程》规定，岳州府设立警务局。1910 年，在县治城内设置巡警局，为警务长督率所属各员办事之所。1914 年东海电灯公司创办，开始供竹荫街、南正街、天岳山、梅溪桥一带商店及 450 多户居民和 10 余盏路灯用电，用电时间每日下午 6 点到凌晨 1 点钟。国民政府成立后，岳阳开始了城市道路、街区的整理和改造，市政得以进一步改善。

株洲的市政建设是伴随铁路建设开始的。这个时期街市的发展更加倾向于考虑铁路运输的因素，在铁路沿线区域商品贸易较为活跃，人口流量较大，街市出现繁荣景象。

五

近代湖南城市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市民参与程度在不断提升。市民的参与，主要体现在对城市社会生活的参与对市政的参与，其重要的表现是社会组织的建立，尤其是商会的建立。商会在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保护工商业者利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清末维新运动开展以后，市民社会组织向政治型发展，表现了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并且为参与地方议会奠定了基础。维新运动期间，湖南成了一批维新政治组织。如长沙的湘学会、南学会、学战会、公法学会、公理学会、法律学会、湖南不缠足总会、延年会、积益学会，浏阳的算学社、群籍学会，衡阳的任学会，郴州的舆算学会，常德的明达学会等等。预备立宪之后，各地也出现了一些学会，如谭延闿创办的宪政协会等等。这些社会组织，主要是由进步知识分子倡导和发起的，但也有商人参与期间，也有官绅与闻其事。著名的南学会，在各地设有分会，于地方重大兴革事项时加讨论，提出方案，供政府参考，并提倡会友对于地方风俗利病、兵马、钱粮、厘金、矿务、法律、刑狱等事，如确有见地，均可提出改革方案，经过学会总会讨论，稟请抚院核夺，批准施行，俨然如地方议会。

1909 年。湖南咨议局成立，虽然有选举人和被选举人拥有财产的规定：“在本省地方有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寄籍本省年满 25 岁之男子或寄居地方有一万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但市民投入踊跃，严格按照以上条件，最后得咨议局议员选民为 10 万人。其中长沙府选举人总数为 37727 人，分配议员数 30 人，所余选举人零数 977 人，补配议员数 1 人，最后确定议员数 31 人。是湖

南最多的议员人数最多的一个府，占了整个省议员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充分反映了市民的参与意识普遍地提升。虽然咨议局只是一个咨询机构，在它存在的两年时间里，召开过两次会议，议决的事项并不多，但毕竟开创了市民参与政治的先例。

媒体的发达程度，也能够反映城市市民参与的程度。晚清湖南最早的报纸是戊戌维新时期的《湘学报》（初名《湘学新报》），该报不仅选刊一些有关的奏疏、文牍、章程、消息及其他维新报刊的重要文章，还广泛介绍外国历史、地理、社会风情、工艺制造、商业政策、国际公法、国际交往、条约制度、银行公债、货币金融、政治制度等方面的知识。而且还采用“问答”形式，向读者详细讲解各种新学，增强了民众对西方国家的认识，提高了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湘学报》在对绅民“开智”方面，有首创之功。此外还有《湘报》，成为国内维新变法的主要舆论阵地，对开民智和新政的宣传都有一定的作用。进民国后，长沙报刊发展起来，官办、民营报纸缤纷多彩。

省会以外，其他城市也陆续创办了报纸，但大多是民国以后创办的。湘潭第一张报纸是1920年创办《湘潭日报》，1926年2月改称《湘潭民报》。1925年冬，《湘乡民报》创刊，1926年，《湘潭商报》创刊。此外，还有《自治周报》（1929年12月创办），《湘声报》（1932年创办）《龙城晚报》（1932年创办）以及《湘乡新报》、《湘乡导报》等，是仅次于长沙的媒体集中之地。而岳阳近代报刊的创办则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酝酿，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由岳阳进步知识分子李澄宇创办的《岳阳日报》，是岳阳最早的报刊。此后，近代报刊作为一项新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在岳阳涌现，如《岳阳民报》、《岳阳青年报》、《湘北日报》等。

城市媒体的发展，拓展了城市市民参与的渠道，也传播了新的观念和意识，有利于推动城市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

综上所述，近代湖南城市现代化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与大多数内陆城市一样，它是启动是被动的，是外力（包括西方列强的强制和后期清政府的压力），其程度也是非常有限的，在新中国建立之时，湖南城市数量少，现代化程度低。当然，现代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也有着发展阶段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湖南城市现代化的发展，仍然是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现代化发展的基础，是湖南城市现代化进程不可或缺的一个阶段。

参考文献：

[1]朱铁臻：《城市现代化发展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当代贵州》，2003年第3期3

[2]《光绪政要》，实业，八。

[3]农工商部：《棉业图说》，卷3，中国棉业现情考略

[4]《巴陵县志》，卷 11，土产。

[5]吴觉夫：《湖南茶业视察书》，《中曰实业》，第 4 卷，第 2 期。

[6]李元度：《平江县志》，卷 20，物产。

[7]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 年版，第 1 辑，第 471 页。

[8]张延珂等：《长沙县志》，卷 20，第 36 页。

[9]吴敏树：《畔湖文集》，卷 20。

[10][12][16]岳阳市地方志编幕委员会：《岳阳市志》第七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第 3、4 页。

[11]刘美炎、唐华元：《岳阳百年大事记》，国际展望出版社，1992 年版，第 90 页。

[13]陈嘉榆修，王阅运幕：《湘潭县志》，卷十一，货殖。

[14]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 424 页。

[15]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华书局，1982 年版。

[17]刘泱泱、宋裴夫主编：《湖南通史》，近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 年版，第 78 页。

[18]李会刚：《湖南工业经济发展历史及展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65 页。